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

RESEARCHES ON THE NEWLY TRANSCRIBED
DHARANIS IN XIXIA

— 孙伯君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

RESEARCHES ON THE NEWLY TRANSCRIBED
DHARANIS IN XIXIA

孙伯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 / 孙伯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04 - 8890 - 3

I. ①西… II. ①孙… III. ①西夏语—语音—研究 IV. ①H211.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5516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华祖根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最近二十几年，随着西夏文献的刊布、解读和西夏语研究等取得诸多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搞清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必须首先明确当时的汉语河西方音。此前利用夏汉对音资料所做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一个致命缺陷，即西夏文也是表意文字，用西夏字来确定汉字的音值往往容易陷入循环论证，因此，人们急切期待着在大量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中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汉语或西夏语的表音材料。而包含丰富的梵汉对音和梵夏对音的佛经咒语可以极大限度地满足这种期待，从而帮助我们系统地重建宋代河西方言和 12 世纪西夏语的音值。

我们知道，20 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目前对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同时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又对这些韵书多有补充和证明。同样，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韵书和《番汉合时掌中珠》，我们可以建立汉字和西夏字音的对应关系，而同时的梵汉对音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字音值的直接材料，两方面材料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西夏语音系统，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12 世纪前后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河西方音，从而使我们接续隋唐五代西北方音发展史的设想成为可能。

本书广搜西夏时期新译的梵汉、梵夏对音资料，首先对这些材料加以文本考察，然后运用译音对勘法，通过汉文、西夏文佛经咒语与相应梵文咒语的对比，归纳对音规律，然后推知汉字的河西方音的读音和西夏字的读音。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decipherment of Tangut materials and studies on the Tangut language, it is gradually realized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at the Chinese Hexi dialect should be recognized firstly before the definition of the Tangut phonological system. There is a fatal defect in the relevant works on Tangut-Chinese transcriptions that it would be called “begging the question” if we reconstruct the phonetic value of Chinese ideograms according to the Tangut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feature,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herefore, to finding some phonetic materials on Chinese or Tangut in the abundance of Buddhist works preserved nowadays. The *dhāraṇīs* with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s and Tangut-Chinese transcriptions will be greatly satisfied with our expectation, and help us to reconstruct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Chinese Hexi dialect and Tangut language in the 12th century.

It is well known that our recogni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phonology comes from the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of *Shouwen Zimu* and *Qieyun* excavated in Dunhuang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ich show u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hyme books in the Sui, Tang and Five-dynasty period. These materials were supplemented and supported by those of the Chinese-Tibetan transliteration from Dunhuang and the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from the Buddhist Canon at that time. By the help of some Tangut rhyme books and the diction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th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Tangut may be established, undoubtedly, the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provide us some visual materials to comprehend the phonetic value of Chinese at that time. Referring to these two sorts of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not only to reconstruct the Tangut phonological system, but also to comprehend the Chinese dialect

spread in the Gansu Corridor of the 12th century,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our tentative idea to integrate with the history of Hexi dialect in the 7—11th century.

The present work collects the Sanskrit-Chinese and Sanskrit-Tangut transcription materials in Xixia period with a textual research, and compares the Chinese and Tangut *dharanis* with their Sanskrit correspondings by means of philology, concluding the 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laws, and then deduces the pronunciations of Tangut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Hexi dialect.

目 次

导论	(1)
第一章 几种西夏新译汉文佛经陀罗尼材料	(17)
第一节 宝源译《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 总持功能依经录》	(17)
一 考述	(17)
二 “尊胜陀罗尼”的梵汉对音	(27)
三 “大悲心陀罗尼”的梵、藏、汉对音	(31)
第二节 八思巴字注音本《密咒圆因往生集》	(39)
一 考述	(39)
二 《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八思巴、汉对音	(42)
第三节 元代藏经中的西夏译本辑考	(55)
一 西夏陀罗尼对音的用字特点	(55)
二 释智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为西夏译本	(65)
三 《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中陀罗尼的梵汉对音	(66)
四 真智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为西夏译本	(68)
五 《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中陀罗尼的梵汉对音	(71)
第二章 西夏译佛经陀罗尼中的特殊标音汉字	(78)
一 加“口”旁	(79)
二 “切身”字	(83)
三 加注“二合”、“三合”	(85)
四 加注“引”	(85)

五 加注“合口”	(86)
六 加注“重”	(87)
七 加注“紧”	(89)
第三章 西夏译佛经陀罗尼的梵汉对音研究	(91)
第一节 梵语单辅音与河西方音声母的对应	(93)
一 梵汉对音规律	(93)
二 梵汉对音举例	(93)
三 对音讨论	(94)
第二节 梵语元音与汉语河西方音韵母的对应	(100)
一 对音规律与举例	(100)
二 对音讨论	(100)
第三节 梵语音节末辅音与河西方音鼻音韵尾的对应	(107)
一 梵汉对音规律与举例	(107)
二 对音讨论	(107)
第四章 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梵夏对音研究	(114)
第一节 概述	(114)
第二节 “佛顶尊胜陀罗尼”的汉、梵、夏对音	(116)
第三节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夏、藏、梵、汉对音	(122)
第四节 从梵夏对音看西夏语的语音系统	(137)
一 梵夏对音的标音用字规则	(137)
二 从标音规则看西夏语的语音特点	(139)
三 从梵夏对音看西夏语的语音特点	(143)
参考文献	(155)
附录一 “尊胜陀罗尼”梵、汉、夏对音字表	(162)
附录二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卷四和“尊胜陀罗尼”梵、夏、 汉对音字总表	(169)
附录三 法藏敦煌 P. 3861 号文献的梵汉对音研究	(183)
致谢	(197)

导 论

翻开历史地理图册，放眼丝绸古道，透过黄沙古堡对读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舞台。有史以来，欧亚各个民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各种角色。他们或手拿刀枪剑戟，或跨马驰骋，互相争斗。1036年，李元昊粉墨登场，攻陷瓜、沙、肃三州，取代了回鹘，成为河西的主宰者。^①1038年，李元昊又进一步称帝，建立了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政权——白高大夏国，中原史书一般称之为“西夏”。西夏在历史上存在了190年，历经十代皇帝，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西夏全盛时期的统治地域以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中心，兼及内蒙古、陕西、青海和甘肃的部分地区，所谓“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②。由于西夏时期尽有河西之地，所以元代径称西夏为“河西”。

西夏都城设在今宁夏银川市，最初叫做兴庆府，后来改称中兴府。西夏的主体民族自称“番”，汉语称之为“党项”，蒙古语称之为“唐兀”，藏语称之为“弥药”。除党项外，西夏境内还有汉族、吐蕃、回鹘、鲜卑和契丹人。

党项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直到11世纪初，他们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上层集团和中原王朝的往来公文一律使用汉文。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和创制者，史书上历来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人们一般认为发起创制文字的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之后由野利仁荣演绎推广，其根据是《宋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元昊]再举兵攻回鹘，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旧地。”（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二，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道光五年（1825）小岷山房刻本。

史·夏国传》中的一段记载：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宋史》记载的这件事发生在李元昊攻陷瓜、沙、肃三州的同一年——1036年。尽管党项人创制本民族文字的目的无非是要为自己正式建国做一些舆论准备，所谓“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①，但这种总数共六千个左右的文字，却为我们记录了卷帙浩繁的文献，使我们借之了解了许许多多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断面。

西夏遗存文献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汉文、藏文书籍翻译过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模仿汉文、藏文书籍的作品，真正由西夏人写的本民族著作很少。

20世纪以前，世人所知的西夏文献仅有两件石刻，一件是1345年刻于北京居庸关云台券洞石壁上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另一件是1094年刻于甘肃武威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进入20世纪以后，始有大量的西夏文献在中国相继被发现，其中最具价值的有三项：

（一）1900年，法国的毛利瑟等三人在北京北海白塔下的一堆废纸和旧书里找到了六卷磁青纸泥金书的《妙法莲华经》。毛利瑟在1904年发表了对其中三卷的初步研究，首开西夏文献解读的先河。这六卷佛经后来分藏法国吉美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图书馆。

（二）1909年，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来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掘了一座塔墓，其中贮藏了大量西夏晚期的文献，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这批文献的确切数目至今无法统计，有人估计有十余万叶，占全世界所藏西夏文献总数的90%以上。20世纪的西夏学就是在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墙时发现了五个瓦坛，里面装满了西夏文的佛经。这批佛经的主要部分后来入藏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

① 《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3995页。

② 同上。

书馆；散失的经卷落入国内收藏家之手，其中有些被倒卖到了日本，现在日本几个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主要来自这里。这批佛经曾经奠定了中国和日本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除去上述三项之外，后来在黑水城、甘肃武威亥母洞、西夏王陵、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敦煌莫高窟等处都还有小规模的西夏文献出土，但是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些发现都远远不能和科兹洛夫所获的黑水城文献相比。

西夏进占沙州，敦煌藏经洞封闭，却并没有终止佛教的传播，而是为佛教在西夏又开辟了另外一片生长的天地。上述西夏遗存文献中，佛经占了大部分，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佛教在西夏的空前繁荣。

史载西夏1038年建国后即着手组织佛经翻译工作。西夏建国以前，佛教在其实际控制区已经颇为流行，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记载，李德明曾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向北宋请求颁赐藏经，^①这是宋朝向西夏颁赐佛经的开始。建国后，西夏又先后几次向宋朝乞赐佛经。^②与此同时，西夏皇帝下令把一些汉文经典翻译成西夏文。最初西夏延请或任命很多回鹘高僧主持翻译，^③其后历经景宗、毅宗、惠宗、崇宗四朝皇帝，历时五十三年，译出佛经凡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这批佛经中有的在仁宗皇帝时期又经过了校理。12世纪中叶以后，仁宗皇帝又下令从梵文、藏文佛经中选取一批藏传密教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仁宗天圣八年丁未条：“丁未，定难节度使西平王赵德明遣使来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从之。”

② 史载，西夏建国后，宋朝又先后五次向西夏颁赐佛经，即宋景祐元年（西夏广运元年，1034）、至和二年（西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嘉祐四年（西夏谅祚祚都三年，1059）、嘉祐七年（西夏谅祚祚都六年，1062）、熙宁六年（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3），参考罗福颐《西夏藏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1—63页。

③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面有一幅木刻板译经图，图的正中间有一高僧像，像上西夏文款识义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据考证此人即回鹘人（参考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另据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九：“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辽史》卷二二《道宗本纪二》：“[咸雍三年]冬十一月壬辰，复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67页）

著作译成西夏文和汉文。

概言之，西夏时期遗存的佛经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类是汉传的，包括西夏向中原王朝求赐的汉文佛经以及据这些佛经翻译的西夏文佛经；另一类是西夏时期根据梵文或藏文新译的，这类佛经也存在汉文和西夏文两种。随着西夏遗存佛经的刊布和解读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夏译佛经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存汉文大藏经的内容，而且为藏传密教各个流派保存了很多重要经典。两类佛经不仅因所据原典不同而在内容上颇有出入，而且翻译风格也有明显的差异，其集中表现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某些佛教术语的翻译前者多用音译，而后者多用意译；二是密咒的对音汉字前者反映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原汉语或长安话，而后者则反映的是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

西夏的大量汉文佛经是从宋朝赎取的，由西夏僧侣自己翻译的不多。目前存世的已考定为西夏新译的汉文佛经有几种，大部分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俄国汉学家孟列夫在 1984 年曾详加著录，^① 部分经文的照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十年前陆续刊布。这些新译佛经多题为德慧和宝源译，嘜也阿难捺传。其中有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德慧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②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③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④ 失译《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⑤ 以及西夏兰

① [俄]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2—161 页。

② 《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俄藏编号 TK. 128，全文照片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3—77 页。参考聂鸿音《西夏译本〈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述略》，《宁夏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和《黑水城所出〈般若心经〉德慧译本述略》，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编《安多研究》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共有两个印本，俄藏编号分别为 TK. 121 和 TK. 122。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9—56 页。

④ 《圣大乘胜意菩萨经》俄藏编号为 TK. 145。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5—237 页。卷首题记已残，孟列夫曾根据“兰山智昭国师沙门”等字样推测此经也出自德慧。

⑤ 《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俄藏编号为 TK. 129。全文照片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7—79 页。

山通圆国师智冥集，夏仁宗皇帝御校的《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①

通过这些经文中所保存的发愿文，我们可知道或推想它们大多都是西夏仁宗时期（1140—1193）刊刻的，如《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刊刻于天盛元年（1149）前后，^②《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刊于天盛十九年（1167）。

众所周知，密教特别强调对经典陀罗尼的翻译和诵读，上述西夏新译经典对陀罗尼部分都做了细致、精确的汉译，不仅某音对某字非常严格，而且标示也非常明确，如为来母汉字加上“口”旁以比况汉语里没有的梵文颤舌辅音 *r* 或颤舌元音 *ɾ*，加上“口”旁的“罗”（la）代表梵文的 *ra*，加上“口”旁的“冷”（li）代表梵文的 *ry*，加上“口”旁的“里”（li）代表梵文的 *ɾ*（>ri）；为影母汉字加上“口”旁以比况汉语里没有的梵文长元音或鼻化元音。例如加上“口”旁的“阿”（a）代表梵文的 *ā*，加上“口”旁的“奄”（am）代表梵文的 *om*；为塞音和擦音汉字加上“口”旁以比况梵文有 *-r*-复辅音的第一个音素。例如加上“口”旁的“得”（ti）代表梵文的 *t(r)*，加上“口”旁的“纥”（hi）代表梵文的 *h(ɾ)*（传统上把梵文的 *hɾ* 读作 *hri*）；为古鼻声母字加上“口”旁以比况梵文同部位的送气浊塞音。例如以加“口”旁的“捺”代表梵文的 *dha*，以加“口”旁的“命”代表梵文的 *bhi*，等等。

上述事实无疑使我们能够在考知这些佛经原本的基础上，明确陀罗尼中的梵语对音规律，进而获得对音汉字的音值，从而全面系统地研究河西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

最近二十几年，随着西夏文献的刊布、解读和西夏语研究等取得诸多进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搞清西夏语的语音系统，必须首先明确当时的汉语河西方音，于是开始注意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文献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龚煌城的系列论文、^③李

① 俄藏编号为 TK. 150，写本册叶装，存卷四。是经为“四分律”的注释，不见以往著录。原件照片刊布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参看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② 两部经的刊布情况和具体考释详见本书第一章。

③ 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范文《宋代西北方音》都是这方面的力作。^①但毋庸讳言,利用夏汉对音资料研究宋代河西方音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西夏文是表意文字,无法直接利用西夏字以确定汉字的音值。不难看出,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以下简称《掌中珠》)的夏汉对音来研究汉语河西方音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而只有首先摸清宋代汉语河西方音的概貌,从而整理出西夏文献中的夏汉对音规律,才能做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语音研究。基于上述事实,人们急切期待着在大量西夏遗存的佛教文献中找到一些能够反映汉语或西夏语的表音材料,而包含丰富的梵汉对音和梵夏对音的佛经咒语可以极大地满足这种期待,从而帮助我们系统地重建宋代河西方言和西夏语的音值。

梵汉对音研究法是指利用梵语与汉语的音译材料的对勘来研究汉语古音的方法。这种方法始于19世纪末,艾约瑟《汉字研究导论》一书从佛典中引用几个对音词,把梵文和汉字加以比照,隐约地看出了汉语果假二摄主元音为a的迹象,最早把梵汉对音材料引入古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当中,可以说是梵汉对音研究的先声。由此,20世纪初,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开始大量利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语音,^②此后又有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③首开国人应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中国古音的历史。从此,梵汉对音法丰富了汉语音韵学的思路和方法,使得汉语音韵学从观点、材料、方法到目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因此认为此文是传统音韵学向现代音韵学转变的标志。^④

1920年,马伯乐(Henri Maspéro)《唐代长安方言考》出版,这部书利用大量的梵汉对音、日译汉音、越南译音、藏汉对音等多种语言与汉语的对音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唐代长安话。^⑤之后,罗常培撰写《知彻澄娘音值考》,进一步利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中国古音。^⑥1933年,罗常培又发

①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钢和泰著,胡适译:《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3年。

③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23年。

④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⑤ Henri Maspé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X, 2, 1920. 聂鸿音译:《唐代长安方言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⑥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1931年。

表《唐五代西北方音》，^① 利用敦煌发现的五种汉藏、藏汉对音写本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成为借助对音材料研究汉语西北方音的里程碑式作品。此后，俞敏发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用梵汉和藏汉对音资料系统研究汉语古音。^② 继之，国内有一批学者撰写了多篇文章，如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③ 刘广和《不空译咒梵汉对音研究》、^④ 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⑤ 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⑥ 通过处理不同时期翻译的佛经中的梵汉对音资料，总结、分析其规律，获得了中古汉语各个时段、各种方言的语音事实。同时，日本高田时雄发表《敦煌资料与汉语史的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⑦ 甄别和补充了几种敦煌资料，系统研究了唐五代河西方音。此外，储泰松《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⑧ 综合利用梵汉对音、音义反切和诗文用韵，研究了以长安话为中心的唐五代关中方音。以上这些成果都通过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对音材料的研究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中古汉语北方方言语音的了解。

利用梵汉对音资料研究汉语，无疑还要依托梵文陀罗尼的复原和拉丁转写。目前佛学界对几部著名经典中的陀罗尼已有比较成熟的复原和转写，如“佛顶尊胜陀罗尼”，藤枝晃等在村田治郎编著的《居庸关》一书中对梵文的校定参考了汉、藏、梵、西夏、回鹘、八思巴字六体石刻，颇值采信。^⑨ “大悲心陀罗尼”也有根据唐宋汉译本所做的复原。^⑩ 此外所涉及的梵文

①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

②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收入《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年。

③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刘广和：《不空译咒梵汉对音研究》，《音韵比较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8页。

⑤ 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⑥ 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⑦ 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东京，创文社，1988年。

⑧ 储泰松：《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 村田治郎编著：《居庸关》第一卷，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版。

⑩ 互联网上有印度国际大学梵文教授穆克纪博士(Biswadeb Mukherjee)的《大悲咒》梵文、拉丁转写诵读本；马来西亚蔡文端先生据金刚智译《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和彭伟洋先生据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所做的拉丁转写复原。

咒语，可以参考清代章嘉呼图克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著的《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① 和日本吉田惠弘著《金胎两部真言解记》，^② 而梵文经题我们可以参考日本大谷大学编写的《西藏大藏经甘殊儿勘同目录》进行勘同和复原。^③

我们知道，20 世纪初发现于敦煌的“守温字母”残卷和多种《切韵》残卷展示了隋唐五代的韵书发展史，目前对中国音韵学萌芽时期的认识大多来自这些资料。而同时期的梵汉、藏汉对音资料又对这些韵书多有补充和证明。借助这些时代确定的资料，学界对唐五代时期汉语声韵音值有了基本的理解，同时在研读这些文献之后，学者们为我们勾勒了以长安话为代表的唐五代时期的汉语西北方音，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高田时雄《敦煌资料与汉语史的研究——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等都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样，借助西夏时期遗存的韵书和《掌中珠》，我们可以建立汉字和西夏字音的对应关系，而同时的梵汉对音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汉字音值的直接材料，两方面材料互相参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建构西夏语音系统，而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12 世纪前后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河西方音，从而使我们接续隋唐五代西北方音发展史的设想成为可能。

西夏人不仅从中原传承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而且同样秉承了受佛经翻译启发而发端的音韵分析。在现存西夏文献中，人们不仅发现了几种汉文音韵学文献，而且还发现了几部模仿中原韵书编定的字典。黑水城发现的两宋时期的汉语音韵学珍本包括宋刻本《广韵》、《平水韵》、韵格簿和等韵门法著作《解释歌义》。其中黑水城出土的《广韵》残本出自北宋仁宗至钦宗时期（1023—1127），为现存《广韵》详注刻本中年代最早的一种。几张无题韵书残叶在编写体例上介乎《礼部韵略》和“平水韵”之间，反映了从《礼部韵略》到“平水韵”的演化中间阶段。韵格簿一般认为来自 14 世纪中叶的某部

① 《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的拉丁转写，参考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台北：嘉丰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参考[日]吉田惠弘著，林光明、林胜仪译《金刚界咒语解记》和《胎藏界咒语解记》，台北：嘉丰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西藏大藏经甘殊儿勘同目录》，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1930—1932 年。

元版书，代表了等韵图较早期的面貌。《解释歌义》为出自宋代《四声等子》中的那句话“关键（门法）之设，肇自智公”做了极好的注脚，首次确切地告诉我们等韵门法的创始人叫智邦，解决了音韵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①

西夏还有几部模仿中原韵书编定的字典：《文海》，^② 体例仿汉文《广韵》，分“平声”及“上声”两卷，另附“杂类”，其“平声”分韵 97，诸韵收字多寡不等。韵下分纽，诸纽首字上有圈发，并于该纽首字下标明反切注音及本纽同音字数。每字之下多四字字形说解，似仿《说文解字》，释义多以同义相训。《文海宝韵》，全称“大白高国文海宝韵”，^③ 归韵收字体例与《文海》全同，每字下注释颇为简略，且于常用字多不出注，有人怀疑此即《文海》简编本。《五音切韵》，^④ 西夏语韵图，排列依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齿头音、正齿音、牙音、喉音、流音九类为序，只列五音而不标字母清浊。《同音》，又译“音同”，^⑤ 字书，不分卷。据卷首序言知此书为西夏多位学者校集，现存本实为二书，一为正德六年（1132）义长重校本，一为乾祐年间（1170—1194）梁德养重校本。二书收字及训释相仿，唯排列次第大异。共收西夏字五千八百余，以声类为纲，列为“重唇”、“轻唇”、“舌头”、

① 参看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文海》平上两卷存一卷，附“杂类”，有残。俄藏 инв. № 211, 212, 213, 7297，存“平声”及“杂类”之半。刻本蝴蝶装，版口题西夏文“文海平”及叶码。与西夏文佛经中之音译规律相较，本书分韵似显极其苛细，不似西夏语音实情，颇疑系西夏人直接承袭某汉文韵书而成。原件照片首次刊布及全文解读见克平等《文海》，再次刊布及汉译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三次刊布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

③ 《文海宝韵》，平上两卷，附“杂类”，俄藏本，写本蝴蝶装，首尾残。或疑此即《文海》简编本，犹中原《礼部韵略》之于《广韵》。原件照片刊布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参看史金波、中岛千起等编著《电脑处理西夏文〈文海宝韵〉研究》，东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2000 年。

④ 《五音切韵》，俄藏写本多种。инв. № 620 写于乾祐癸巳年（1173），第 77 面，保存完好。蝴蝶装，有序言 6 行，有软革护封。原件照片刊布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参看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20、21、22，1981—1983 年。

⑤ 《同音》，俄藏 инв. № 207, 2619, 2620, 2982, 4775, 4776, 7934。又有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出土残叶多件。刻本蝴蝶装。全部原件照片刊布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7 册。参看李范文《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史金波、黄振华：《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民族古籍》1986 年第 1 期。